



要我写 我要写 要写我

——我的文学之路 □刘兆林

—
命定的，一个还不会坐、只能躺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一出生便与新中国一同站起来了，这不能不给我打上终生的胎记。

命定的，母亲把我生在与鲁迅先生极为赞赏的女作家萧红故乡呼兰隔河相望的巴彦。命定的，少年时代最令我惧怕却在我故乡小镇上当中学教师的父亲，让我知道隔河相望的呼兰出了个女作家萧红。所以，也就命定了，永远31岁的女作家萧红和永远54岁的鲁迅先生，相映生辉，成了我青年时代崇拜的文学榜样，不能不感谢我恨过恨过的父亲。当然，更加命定了，一生都没法让我改变对鲁迅先生赞美有加，却对略喻文采的秦皇汉武、稍逊风骚的唐宋宋祖瞧不起的诗人领袖毛泽东的敬仰。

这些命定，我无法改变，我也没产生过要改变的愿望。庆幸，我能和新中国同龄。

50多岁那年，我写过一篇散文《我的粮食关系》，说了说新中国如何以食为天，解决吃饭问题，让多数人过上温饱生活。过了60，我却返老还童，写了篇《童年伴我一生》，说了说少年时代的成长情况。今年，该说说，在我而立之年便自己选定了的文学之路，是如何与新中国同甘共苦走到今天的。

二

也是命定的，18岁那年，尚在学校眼巴巴盼望考大学的高中生，我却意外被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录取，投笔从戎了。但是，从戎却没丢掉笔。当然，这意外也含有必然的因素。高二那年，我就曾与10多名同学结伴，利用无事可做的假期向解放军学习，身背行囊，从滴水成冰的黑龙江老家出发，顶风冒雪，不走大道抄小路，徒步40余天，行程4000多里，一步步走到北京。每天，解放军那种斜背的小小挎包里，竟然塞了两本厚厚的大书（我们老家那儿的青年都把小学生看的连环画册叫小书，而把大人读的厚本子书叫大书）。我挎包塞的两本大书，一本是长篇传记《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另一本是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我从小喜爱读文学书，《水浒传》《三国演义》《杨家将》《一代风流》《战斗里成长》《风云初记》《三家巷》《苦斗》及苏俄一些文学大师及其他外国作家的一些代表作大书。我们一群徒步于冰天雪地的高中生，一路严格按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自己，不管吃住到谁家，都分两不差交够粮票和伙食费，也不管多累，走前都要把房东的水缸挑满，院子扫净，偶尔吃了特做的一碗清汤饭，一定要多交点伙食费。后来伙食费和粮票用光了，便签名盖章加按手印打欠条，返校后一一寄还。说来简直如神差鬼使，假期一结束，我们等待升大学的80多名高中生，竟意外被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录取了。这在当年，并不亚于考上名牌大学。于是我投笔从戎，成了黄海前哨守备部队炮兵团一名侦察兵战士。

我以为，既已从戎必得投笔了。文学梦和文学书一并投掉，全心全意当起侦察兵来。我们炮兵连侦察兵，任务是运用计算器，迅速将打击目标方位和射程计算精确，所以我每天的任务，是摆弄计算盘，练精数学计算功夫。而我这个一直钟情文学的数学低能儿，年终却因计算业务评上五好战士，还成为侦察班长，我以为文学梦再无法死灰复燃。没想到，第二年炮兵团受命参加驻地城市国庆大游行，我们炮兵方队所到之处赢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使我看开国大典黑白片时燃起的激情突然复发，一首小诗油然在心底生成，并很快在该市报纸副刊发表了。更没想到，我一年多计算的苦功夫白费了。团政治处一个电话把我调到宣传股报道组，被破格提拔为新闻宣传干部，手中的计算器，忽然变成天天在稿纸上勾来画去的钢笔，我的投笔从戎，又变回从戎并没丢掉笔。师里每个季度都要评比通报各团发表稿件数量。炮兵团人员最少，任我如何挠头苦思，也无法名列前茅，我不得不从自己那首意外成功的小诗悟出新思路：新闻稿不够，诗歌散文凑。我重操在校办文学小报时的旧业，把全团驻地新人新事新气象等等，对应新闻、诗歌、散文、随笔诸文体一并写来，发稿量在全师很快名列前茅。可是守备区又批评强调，不能以文学作品充新闻宣传稿件，如此我便无法名列前茅了。忽然一天，我们这个千军万马驻守海防前线的多兵种守备师，一夜之间，官兵一律全副武装钻进“沟罐”，坦克、大炮、汽车统统爬上列车，向遥远而奇寒的北方前线开去，目的地正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占据过的战略要冲，苏联红军也是从这一战线进入中国的。而我们调往该地之时，珍宝岛自卫争夺战刚结束。步兵、炮兵、坦克

兵、以及骑兵、通信兵、运输兵诸团队组合的多兵种守备师调防，任务有多急难险重，可想而知。新驻防区多是蒙古族居民，语言、交通、生存、训练、安营扎寨，衣食住行，样样从零开始。皮帽子、皮大衣、皮手闷子、皮大头鞋，甚至皮裤子，与战争年代比，只差炮火纷飞啦。我们宣传股住的是空弃多年的破房子，晚上合衣睡在没席子，也没法生火的土炕上，做饭的柴草都得大家蹑雪上山去捡。春天冰雪刚化，各团队就开始自己动手建造营房。没有菜吃，啃咸菜，喝酱油汤，空酱油瓶装上凉水算是上好饮料了。有次我背着行李，徒步到较远的一个连队去采访，途中渴急了，手捧车辙里的浑水，喝着嗓子生疼。晚上住在连队刚封顶的泥屋拉起了肚子，起夜时正好发现，我靠着的湿间墙壁眼看要倒了，不由得怀着对坏我肚子的脏水的分外感激，喊醒正鼾声四起的战友。第二天重新砌好那堵倒塌墙，我又继续躺在墙下构思要写



的稿件。我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心理习惯，就是那时和大家共同养成的。怕苦怕死，甚至沾了一丝怕累の評语，谁都觉得羞耻，连所写稿件内容没亲身参与，也觉惭愧。大兴安岭山谷多少崎岖小路，科尔沁草原多少草屋村庄，留下全师官兵多少无法计算的足迹啊。冬天的雪地露营，夏天的长途拉练，甚至每个连、营、团的春秋秋收，无不凝结着与蒙族兄弟的鱼水情谊。那时，全师的共同口号是：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被师首长概括为“四边”思想。落实到我，便成了“以笔为枪，准备打仗”。我自觉地围绕这一主题琢磨文章。我几乎成了兴安岭大山谷中的铁道游击队队员：稿件从邮局正常寄往报社，要一周时间，而“时刻准备打仗”要求的我，重要稿件都得赶点往火车站站，托付车上的军人或列车员带邮，更重要的则要千里迢迢送往报社。我曾在“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风雪之夜，抓住已开动的列车门把手，在车厢外吊了很长一站路，险些冻伤。有回我刚从火车站找人代捎稿件回来，团长同志拿起一张刚到的《解放军报》问我，这是你写的？我一看，是副刊版发表了署我笔名的散文《第一组照片》。我点头，他又翻到头版让我看，头条竟是通栏大标题转载的《人民日报》要论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天哪，这不是全国停滞数年的文艺创作，又被党中央重新提出，并号召大力发展的吗？团长拍拍我的肩膀，你行啊！不久我又发现，属我笔名的那篇散文《第一组照片》被多家报刊转载，还被向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和某省中学语文课本选用。从此，我命运方向迅速向自己热爱的文学之路转折。各大军区迅速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我成了既是被顺藤摸到的青瓜，也是甘愿投入的湿果。历时好几十天的创作学习班结束后，我接连在停办数年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乌兰哈达》《流水清清》等反映我们团生活的散文和小说，而且破天荒都署了真名，这在全军都不是小事。需知，全国所有文艺期刊统统停办了有几年了。《解放军文艺》忽然率先复刊，而我只是个无名鼠辈，能署真名接连刊发作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不仅没受批评，还先后被调到省军区和大军区文艺创作部门，名正言顺地成了“文学作者”。这一称呼，简直不亚于20年后正式获评一级作家职称。

三

随之而来，我的苦闷期也到了。越是真正深入生活，越是多读中外文学名著，越是发自内心有独到思考的作品，反而越难以发表了。那苦闷是难以言说的，甚至有领导和朋友认为，我是不是骄傲自满，不求进取，或江郎才尽啦？恰值这期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真理标准大讨论等风雷激荡的思想解放运动相继发生，我的苦闷和抑郁，随之烟消云散。新创作的几篇小说《小杨和他的

三个熟人》《新兵老贺尝到的滋味》等相继问世，使我成为重新恢复的省作家协会会员。这一新名分，比之“文学作者”，于我有点类似刚入伍时团员变党员那般欣喜。随后，我有幸作为全军最年轻的代表，出席了中国文艺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间，那本并不精致的代表名册，令我如获至宝。册中许多我久闻其名并熟读其书的著名作家们，竟会与我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茅盾、巴金、曹禺、丁玲、贺敬之、刘白羽、艾青、柳青、欧阳山、茹志娟、孙犁、王蒙、邓友梅……尤其同在解放军代表团的徐怀中、李瑛、魏巍、白桦、王愿坚……目睹到他们的尊容，个个都熠熠生辉。

会后我一趟趟深入漫漫东北边防线，甚至骑自行车走遍黑龙江、乌苏里江沿线每个守备连队。眼光变了，眼中的英雄形象也换了。那种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只知埋头拉车走旧路，不会抬头

寻新路，别人开出新路还要顽固反对的左牛形象，令我憎恶，由此写出一批新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雪国热闹镇》，其主人公是个特殊情况下，宁被误解越境叛逃，也敢深夜潜入敌国，仍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事，以物换物，救活初生无奶而濒于死亡的婴儿，自己却被送进劳教所反省改造受处分的无私开放的崭新战士形象。该作曾被数家刊物退稿，后被《解放军文艺》推出，很快在文学界引起反响，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乘兴又以回老部队代职体验生活的新素材，写出与以往有脱胎换骨意义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赞美武装集团中的官兵人格平等，而不靠绝对的下级服从上级铁律维护战斗力，进而激发出的比枪声更震撼心灵的人性力量，因而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八一电影厂拍成同名电影，获全国优秀故事片奖。感谢伟大的改革开放，使我一年内的两部作品，连续荣获当时的全国最高文学奖，并因此被推荐考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就读两年半。

在学期间，联系自己文学观念的薄弱环节和生活积累的长处，又读了一批外国文学名著，及现代派、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的作品，把自己以往的创作观念，与这些外来的新观念尽量融合。还利用假期奔赴老山前线，在猫耳洞和战壕过春节，冒着炮火深入战区生活，写出小说《秋声》《违约公布的日记》《雾里一团烟》。还深入新疆和甘肃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熟悉从事核武器研究试验的军人科学家们的生活，写出《九号半》《崎岖的小路》《遥远的绿叶》等作品。鲁院毕业后，全班同学集体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就读，我因读鲁院前已取得辽宁大学中文系学历文凭，便退学回沈阳军区创作室当专业作家。

几年地方大学的读书生活，反而使我更加热爱部队生活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又创作出一批中篇小说，如《黄豆生北国》《船的陆地》《因为无雪》《三角形太阳》《黑土地》《一江黑水向东流》《我的大学》《妻子请来的客人》等。我还特别申请回到老部队，代职师政治部主任，并创作出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绿色青春期》，获当代青年喜爱的优秀图书奖、首届东北文学奖等。再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被地方党委选调，转业到省作家协会。24年的军旅情怀，任我转到哪里也无法磨灭。我又以数年地方生活的切身体验，以转业干部为主人公，创作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不悔录》，获曹雪芹长篇小说奖。可以说，我的多数作品都与我的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四

退休后，我发挥曾经的军旅生活优势，以著名东北抗日将领郑铁梅为主人公，创作了长篇传记小说《国将铁梅》，在《中国作家》发表。又以备受鲁迅先生推崇、我也特别喜爱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为主人公，写出长篇传记小说《儒林怪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外，追随时代脚步，还写下四五十万字散文作品，包括《父亲祭》《感谢跳舞》《献给母亲的花》《一次遗憾》《丝绸路上的少女》《巴彦雪》等。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创作，我一向遵循的原则是：要我写，我要写，要写我。解释一下便是：既是时代要我写的，也是我自己由衷要写的，并且要写我亲身经历或熟悉了的。进一步解释一下则是：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自己。

以上感想所提及的400多万字文学作品，既是我文学之路上的串串浅浅脚印，也算我献给同龄共和国的一份薄薄礼品。

窗口文学课

□梅子涵



我在农场当过“知识青年”。其实我们应该算是“没有多少知识的青年”。那时的我们，年纪也都几乎只是前面的脚刚跨进18岁，后面的脚还在17岁。我们这些没有多少知识的人被喊成“知识青年”，心里还是有一些光荣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没有知识。

我们每天都好好劳动。可是如果只是劳动，没有书籍阅读和学习，那么那一点儿的光荣知识很快就会不见了，然后变得越来越没有知识。所以，我在的农场砖瓦厂，就依然像学校一样，建了小图书馆，路边还竖起橱窗，让我们有书阅读，也可以写了文章贴在里面，让别人读到。我就写了散文贴在橱窗里，然后站在远处偷偷看有没有人看我写的散文，不管是女生看，还是男生看，只要有人看，心里就喜悦，就觉得自己有水平，那时的光荣感真是很容易产生，“虚荣”得非常精神和浪漫，那时的心里装着的都是浪漫主义，而非物质主义。

后来，上海的文学杂志编辑到农场来寻找知识青年中的文学创作，就把我贴在橱窗里的散文揭下拿去发表，他们揭下的时候我站在旁边，他们说：“这篇不错，我们带走！”然后他们就走了，没有喝一口水。那两个编辑一个姓朱，一个姓刘，也都是青年，很有才华，是新生生的诗人和剧作家。

散文被放在一本书的首篇，收到寄来的那本书是在5月4日青年节，我独自庆祝，到河对面的农民家里买了一斤新鲜豌豆，几个鸡蛋，向别的知青借了一个煤油炉和一口小锅，豌豆炒鸡蛋，绿的和黄的，清清爽爽，吃完了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的散文发表了。信的最后照例是那个年月的很不散文的严肃和正经：此致、敬礼。和自己的妈妈此致敬礼。

那个年代，文学是低落的，但是，文学依然还是在人的心里。农场的管理者，他们也不是只知道水稻和棉花，所以，也不知道是谁，就邀请了作家来给喜欢文学的知识青年讲课。场部通知我，下午去听，我就兴冲冲地去，沿着大堤走，一个多小时到达。

在一个草棚棚里，坐着一个女作家，她真是天底下最像作家的女作家。怎么会那么端庄、优雅，一副眼镜被她戴着，满脸神情里全是知识和修养，穿着最普通的布衣服、布鞋，好像是我后来在电影中看见的延安鲁院的女性，因为革命，因为人生激情，不在城市，来到乡下和山里。

当时只有四五个知青，那个年月，文学毕竟不容易风起云涌，她请我们坐下，指指窗外的西面，说：“我在新闻出版干校，农场让我来和大家谈谈文学创作。”我便油然觉得神圣、美好了，“文学创作”几个字像是抓牢了我要飞起来，兴奋得有踏云之感，好像被人领着要迈进一个异常高级的疆域和境界，之前自己的幼稚写作和发表，都属于无师而行，现在听见“文学创作”4个字，对于我完全超出了一个词语的意义，意味着一种正式和名堂。我后来作为一个文学教授和作家，每当我对想写作的学生和爱好者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也总是能从他们的眼神和呼吸中看出、听出我自己当时的兴奋悸动。

那时上海的很多干校都在我们农场，文化干校在我所在砖瓦厂对面，隔一条河，巴金等先生们都在那里。新闻出版干校在我们的西面，《文汇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的记者、编辑们在那儿学习和劳动。

女作家介绍了自己，在当时幼稚的我们面前，她的名字是陌生的，而后来，才知道了她的有名和重要。她还是有名的《新民晚报》的副总编。我从初一开始，每天放学，经过邮局，都会买一份《新民晚报》。

我是后来才知道她的有名和重要。

我总是愿意想起当时的情形，想起她婉

婉的上海普通话的明明白白的表达，明明白白地说文学。我现在已经不能逐字逐语、逐句逐段地想起她当时说的话了。可我永远都会记得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的情景。草棚棚也是有窗口的，窗外是农场场部，四处长满了田菁，它是一种改良盐碱地的植物，在盐碱地的海滨农场，它也算是一种绿化，是生命的活力和希望，农场指望着它把白花花盐碱消除去，多打粮食，多种棉花。

还可以看见中心河，它很清澈，一直往东而流，经过我所在的砖瓦厂，我们烧制出的红砖红瓦，被一只只的水泥船运走，送到农场的四处，所有连队新盖起的红色房子都来自我们砖瓦厂青年的一日三班，一年四季。

副总编女作家问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站在这里看得见什么呢？”

我们几个人像小学生一样轮番、交替地回答：

田菁、河水、田野、大堤、连队宿舍、拖拉机、天空、云彩、麻雀……我们觉得应该看见的我们都已经看见了。

她婉婉又优美地说，你们再朝更远的地方看。新筑起的海堤，新海堤之外，更新的海堤很快又会出现。农场就是这样一点点被围垦了出来，向着远处伸去，更广阔，我们不是说，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所以你们还能看见什么呢？

我们还能看见什么呢？

我们看着她，只能等着她告诉我们。她说，她还看见了更远的海滩上的新的脚印，又有人在往前走去，他们的脚印曾经留在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现在又到了远处。农场的广阔和收获都是他们的脚印带来的。她说：“写作文学，要看得见‘脚印’。”

那一刻我听得沉默而澎湃。她说的真是一个很基本的原理，可是对于幼稚的我，那一刻却烟花绽放。能够知道，怎么把最基本的文学道理、生命敏感说给幼稚的人听，让他们瞬间地明白，走出“窗口”，往远处行走起来，难道不是一种很高的水平吗？后来我阅读的许多原理著作和文学作品，它们是我文学路上的添柴和蓄油，是我一直没有停下的“自动发条”，安装在我的文学劳力士和浪琴里，但是那次窗口女作家的简单、明了，却是一次真正重要的幕启，是我们上海从前的那个有名的长宁电影院里开映时的钟声，“当”“当”“当”——黑暗中红帷幕徐徐拉开了，银幕亮了，故事在那一块白幕布上开始。

白幕布上的故事在放映室窗口射出的那一道光里，我小时候一直奇怪，那一道射来的光没有字、没有画面、没有人的声音，可是一落到幕布上，立刻就有声有色、有哭有笑。我后来当过作家，也当过教授，我的一些学生也便是由此成为了作家，在中国的儿童文学里，我的确是培养出了一些作家的教授，因为我比较会把那一束光打射到白幕布上。

后来，我又遇到过那位女作家，我对她说起草棚棚里的那个下午，问她记得起来吗？她说：“记得起来。”后来有一次，我在大学主持一个文学讨论会，已经老了的她被别人扶着走进了讨论会的小会场，她问我：“我可以进来听听吗？”我吃惊得差点哭起来，喊着：“是你啊！”

在场参加讨论的都是年轻的研究生们，很多是我的学生，我扶着她坐下，然后告诉他们上面的故事，我对他们说：“她是我的第一个真正的文学老师，我们一起向她致敬吧！”

我的这个站在草棚棚窗口授课的文学老师，现在还健康地生活着，已经离100岁很近了。她一定会婉婉地跨人的，因为她一定依然还戴着一副动人的眼镜，因为她每一天还站在她家的窗口看着这个世界的脚印，她都看得清清楚楚，深情动人。她叫欧阳文彬。